

POSTMODERN PSYCHOANALYSIS

后现代精神分析

Essays by
Norman N. Holland

[美]诺曼·N·霍兰德 著
潘国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夏青根

封面设计：周志武

后现代精神分析

〔英〕诺曼·N·霍兰德著

潘国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7,000 册

ISBN 7-5321-1227-6/I·940 定价：13.00 元

中译本序

诺曼·N·霍兰德

当潘国庆建议我将我的一些论文编译出版时，我感到极大的荣幸。当他建议我为这部论文集撰写一篇序言时，我欣然同意。这是一个反思和综合的极佳机会。我将回顾将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这部论文集收集了我从1960年到1991年（或1993年，如果你将这篇序言也算进去的话）所撰写的十四篇论文。在这里我所需要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论文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在六十六岁所能写的东西跟我在三十三岁所写的东西是迥然不同的。

回首往事，我认为有两个重大发现形成了我的学术生涯。其一是新批评学派。我正是在诗人西德·科门所领导的一个诗歌学习小组中发现我自己对这种阅读文本方法具有一种特殊才能。我对这种方法运用自如并且能使许多人信服我的阐释。而且，我也喜欢这样做。许多杂志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所在的英语系也奖励我所写的东西。

我认为新批评派的细读方法使文学民主化。文学巨著不再

为有教养和有钱的人服务。我一直是一个叛逆者。我认为这种阅读方法迫使那些熟知所有文学史事实的学术权威放松了对文学的控制。文本向所有的人开放。新批评对我来说似乎是将肇始于理里斯德多的传统推向顶峰。在五十年代，我所敬佩的批评家——主要是肯恩思·伯克和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是约翰逊博士和撒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继承人。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他们将英语文学的美妙文本为普通学生和读者打开。在我看来，这是西方文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即使在过去十几年中，新批评遭到怀疑和批评——许多批评家已证明新批评的假设是错误的，它仍然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高峰。

在我运用新批评时，我的目的是显示一首诗歌或故事各个部分是如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这种方法在于将文本的细节组合成主题丛：例如，《哈姆雷特》中的疾病意象或这部剧所运用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我又将这些主题组成更宏大的主题：疾病意象跟腐烂或臭味意象结合起来构成更大的腐败主题；对语言的兴趣跟对行动的讨论相对立。最后，我将所有这些主题组织起来，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贯穿全部的主题：腐败使语言和行动无法统一起来。然后，我可以回到《哈姆雷特》的具体细节去。我可以证明任何特定的句子通过一个或更多的主题是跟有机整体的核心相关联的。

在运用新批评时，我感到信心百倍，驾轻就熟。在那时，我教授莎士比亚。在课堂里，我向我的学生提出挑战。我叫我的学生任意从一部剧中挑出一句句。如果我不能将它们跟全剧的主题联系起来，我的学生将赢得一瓶威士忌酒。我向我自己和我的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莎士比亚的“错误”，如《奥赛罗》中的时间错误或《维洛那二绅士》中混淆的地名。我可

以证明连这些错误也符合全剧的风格。

发现这样的统一体使我如此地舒心，以致于成为我的一个癖好。这是一种有益的癖好。它使我不停地写作，诠释这个文本或那个文本。只是在几年以后——在我接受精神分析以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统一体对我来说是那样地舒心。我发现，我的渴望导源于我童年时代只有一个卧室的纽约公寓。

精神分析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第二个发现。我接触精神分析是比较特殊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和我的同学收听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杰出的无线电喜剧演员时，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查利觉得这个笑话好笑而我不觉得好笑？为什么我和布鲁思所记得的情节不一样？谁对或谁错？难道这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吗？

在研究生院，我能够在我的博士论文——一种用新批评方法诠释埃斯里奇、威彻利和康格里夫的轻松腐败喜剧——中发展我对笑的兴趣。我开始教授一门喜剧课程，于是我阅读了大量阐释笑和喜剧的文章。在所有的理论中，只有弗洛伊德的理论言之有理。弗洛伊德不是用演绎的方法将笑话归纳成一个个像进攻性和不协调那样的范畴。相反，弗洛伊德却使我回归到笑话的语言——这恰恰是新批评派的方法。

我越思考这个问题，我越坚信，精神分析提供了我正在寻找的理论工具。精神分析要求密切注意进行自由联想的病人的语言。只有精神分析理论才能解释我们对语言的反应。我们可以将弗洛伊德的笑话和喜剧理论扩展到对文学的反应的普遍理论中去。

我对精神分析的前途充满信心，所以我决定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尽管这种训练需要许多钱和付出许多努力。幸运的

是，我妻子的叔叔欧·亨利·克兹是一个著名精神分析家，完全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他愿意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我完成我在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的学业。从1959年到1966年，我的精神分析家伊丽莎白·罗森伯格·扎特尔和我的其他老师们循循善诱，使我对那个时代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微妙之处有了透彻的理解。

各种讲座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在那里掌握了两个思想。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大多数精神分析批评所使用的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外乎“恋母情结”这个概念，并且将此局限于小说和戏剧，因为在小说和戏剧里我们可以找到家庭三角关系、爱或死亡愿望、嫉妒、象征性的阉割、父亲和母亲的形象。

在我现在参加的讨论会中，我认识到儿童发育的前恋母阶段及其后果是如何成为成人行为的模式的：早期口唇阶段对母亲的依赖关系；肛门阶段力图控制和按时行事的愿望；在尿道阶段计划和抽象的问题；在性器阶段控制和进入的主题。

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些阶段，尤其是恋母情结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它们是否在中国存在？西方精神分析学家根据人类学对其他文化的研究成果，声称这些阶段是普遍的。各种考察表明这些阶段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出现。这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呢？证明这一点的方法是考察中国文学。

我在论述西方文学时认识到，对于这些前恋母阶段及其相应的幻想了解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他的各种幻想。我逐渐认识到，莎士比亚剧中的意象经常跟一个前恋母阶段相符合，虽然该剧的主题是恋母主题。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文学文本具有几个层次，任何给定的文本具有不同的幻想层次，从最早的自我

与他者的口唇问题到恋母三角关系的爱、恨和嫉妒。

在这些讨论会中，我所学到的一个主要东西是防御概念，在那时，除了弗洛伊德将防御概念用于笑话以外，没有人将它运用于文学研究。防御是对付内外现实，尤其是不同的心理机制和现实冲突的方法。我们以许许多多的方法进行防御。我们压抑痛苦的思想或情感。我们否认感官的事实。我们将思想和情感互相割裂。我们将感情，比方说，进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过度的仁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逐渐认识到，这些防御机制是文学著作将前恋母或恋母期的幻想转化成我们新批评家在文本中所发现的那种意义。

防御和前恋母阶段这两个观念正是我所寻求的东西。我可以建立起一个普遍的文学模型。这一模型是从文学和喜剧模型中延伸出来的。文学文本展示了心理过程。那一过程包括了人类发育成长中不同阶段（口唇、肛门、尿道、性器和恋母）相互关联的幻想。文学技巧、形式和结构及其相应的心理机制将这些幻想转化成意蕴。这种转化结果是一种意蕴、意义或伦理道德价值——任何读者希望在文学中找到的东西。这是我在1963年开始发展的模式，首先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出现，然后再以书的形式《《文学反应动力学》》^①，1963年）出版。

精神分析训练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体验，它使我认识到，你愈了解精神分析，你愈能将精神分析应用于文学研究或任何其他问题。想要了解精神分析，你必须从临床着手：你要么对自己进行分析，要么研究案例史。

比讨论会更为重要的是我跟伊丽莎白·扎特尔的分析。在

① 《文学反应动力学》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跟她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了比文学文本的统一体更为重要的统一体，即自我的统一体。我逐渐地意识到——从我自身得到证明——纯学术活动（像我对新批评派的热忱）表达了深深植于早期生活的个人需求。而且，人们可以在成年生活中追溯这些同样的主题在截然不同的行为领域中的各种表达形式。学术信仰跟我们同朋友、同事、上司、孩子和伴侣的关系一样表示同样的需要。虽然我们 must 克服压抑机制去发现我们性生活中的偏好，但这一偏好更直接、更明显地表达了这些需要。因此，比文本的统一性更为重要的统一性是人类自我的统一性。

但是，这一统一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没有消除自我内在的冲突。我们毕竟都经历过欲望与伦理之间的冲突，不同思想之间的冲突以及对统一性的渴望和对统一性的恐惧之间的冲突。我们对文本新批评式的控制力量也是一种弱点，即无法对文本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也许我的最为古怪的发现是这一精神分析的格言：人所希望的，人亦害怕；人所害怕的，人亦希望。但是所有这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发生于单一的个人风格之中。作为恐惧的希望，作为希望的恐惧——它们都是我的恐惧和我的希望。统一是冲突；冲突亦是统一。它们两者都是我的一部分。

1966年，我移居布法罗。在那里，我碰到了几个精神分析批评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罗杰斯、穆利·史瓦茨、克里斯特法·波列斯、克莱尔·卡汉尼、大卫·威尔本、杰姆·斯威尔。我们组织了一个正餐与讨论小组。我们又建立了文学与心理学博士项目。这一切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和教学活动。说实在话，当时我们能够给我们的研究生提供一定的临床经验。

在波士顿学习时，我接触到海因茨·利奇顿斯坦的思想，

但是我是在布法罗亲自见到这位精神分析哲学家的。利奇顿斯坦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类性格思想。他论证说，我们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史读作一个主题以及那个主题的变异史。生活是一件艺术品。生活有一个主题及其变奏，就像音乐或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他的本体理论恰恰跟我对统一性的追求以及我的新批评技巧相符合。在我们的写作和教学中，布法罗小组开始把作品读作整体作品或他们本体的体现。我们找到了一种考察作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新方法。

与此同时，我开始测试我的《文学反应动力学》中的思想。在纽约州的赞助下，我雇佣了一组学生参加我的试验。他们为我阅读短篇小说，跟我讨论各种文本结构问题和自由联想。他们的反应显示出比我所能解释的更多的多样性。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大卫·布里奇的帮助下，我开始怀疑新批评派关于阅读的主张。对于新批评派来说——对于我的《文学反应动力学》的模型而言——阅读对于每个读者都是一样的。幻想内容、防御性形式和结构全部“在”文本之中，是持续不变的。不同的读者在意蕴、道德或审美价值层次上对一首诗或一篇小说进行不同的阐释。而文本的本身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引发相当固定的反应。

但是这并不是我倾听实际读者所发现的东西。他们对特定人物、事件或词组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的情感反应的差异就更大了。简而言之，只有一些固定的或“恰当的”反应的思想只是一种幻想。

在思索良久之后，我发现，用利奇顿斯坦的方法释读他们的本体，我可以理解他们反应中的差异。也就是说，通过考察山姆和桑德拉的本体主题，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山姆以这种方法释

读一个特定的角色，而桑德拉以另一种方法释读同样的角色。我可以把他们阅读中的差异读作他们个人期望、幻想、防御和转化的模式上的差异。《文学反应动力学》的模型是正确的，但是进行转化工作的是读者，而不是文本。文本只是原材料。我必须将《文学反应动力学》中所描述的转化设在读者之中，而不是文本之中。

这样一来，我的学术世界完全颠倒了。我曾假设幻想、结构、形式或人物固定“在”文本之中。它们是研究和教学的实在客体。现在我们证明它们是变化无常的。它们根本不“在”文本之中，而是“在”不同个人对文本的创造之中。从读者角度来看待文学要求我完全改变我对文学教学和分析的侧重点。

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从现在回过来看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始终如一地谈论一个文本，仿佛它完全是跟我们分离似的，因为我们除了通过某种人类感知过程之外是无法感知文本的。这些过程人与人之间不同，社区与社区之间不同，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同。我们只有在承认自己在感知中的作用的前提下才能谈论文本。我们的个性、信仰和文化甚至影响最为简单的感知材料。

为了传授这些思想，我和穆利·史瓦茨、鲍伯·罗杰斯发起了“忒菲尔”^①讨论会。在这一讨论会中，学生们探讨他们对文本的反应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反应。这些讨论会为读者反应的前提提供了进一步证据。我在《诗歌在于个人》（1973）和《五位读者阅读》（1975）两书中解释了这些变化。在那两本书中，我用读者反应的研究成果取代了现在对我来说是虚幻的“对文本的

① “忒菲尔”意思是“认识你自己”。

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主体和客体的混淆从一开始就隐含在精神分析之中，但是它被弗洛伊德的信念——他在将主体和客体视为相互分离的十九世纪的范型中发展一门科学——相遮掩。而且，我开始认识到，我对事物的观念在很久以前已经成为“学院派”心理学的主要范型。行为主义将内部过程孤立起来的方法让位于“心智新科学”。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现在正在探索内部心理过程是怎样控制感知、记忆、认知和我们对语言的使用的。他们建立的人类心智模型正好跟我的读者反应研究相吻合。它们两者都同新批评格格不入。

文学教授们也同样拒绝新批评，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的出发点是雅克·德里达和解构主义。我的文学批评同事们现在孜孜以求的是非统一、颠覆、矛盾和等级结构的分裂，跟他们寻求其对立面如出一辙。对统一性的追求在许多方面被看作具有欺骗性。统一性忽视了那些不适合的东西，将它们推到边缘地带。因此，对统一性的追求被看作是保守的，因为当时保守主义支持赞成灾难性的越南文学。非统一性和斗争更符合当时的形势，人类心智的非统一性更是如此。

批评家们认为，语言或“言语”而非心智统辖人类行为。文学理论家用索绪尔的十九世纪的词典语言学——这种语言学基于单个的词和词语，即能指和所指——来证明这种语言决定论。因此，他们向后大大地倒退了一步，因为诺姆·乔姆斯基通过集中研究句子形成和对句子的理解对语言学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文学理论爱用的一个策略是假定索绪尔的能指表示所指，所指又反过来变成了能指，表示所指；所指又变成能指……将人完全排除在这一幅图画之外。“人文主义者”一词似乎变成了

一个诅咒之词。

在五十年代末当我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时，精神分析在文学圈子里是不受尊敬的。我记得，我暗暗祈望文学之士能够对精神分析产生更大的兴趣。出乎我意料，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文学专业人员爱上了精神分析，但是他们对待精神分析的方法是跟我的方法格格不入的。他们把精神分析变成哲学，深奥难解，完全非人化。

拉康成为文人们喜爱的精神分析学家。像解构主义者一样，拉康假定人类心理的非统一性。他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连贯性推导出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根本不连贯性。1971年我参加了拉康在圣·安尼医院举办的临床案例讨论会。我发现他对精神病人的行为是残酷的并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我还发现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它基于一种错误的语言学(索绪尔)和同样错误的人类处理语言或经验的观念。简而言之，我发现，他的著作是一种准行为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歪曲。我对我的同事们对拉康著作的巨大兴趣感到困惑不解。其实，正如我的同事伯纳德·帕里斯所说，拉康向自我异化的人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他们自己确信，自我异化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的。

在当今充斥学术用语的批评理论沼泽地中的一个闪光点是女权主义——其实是某些女权主义。有些女权主义深陷在解构主义或拉康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而另一些则坚持在阅读和其他经验中性别的充满活力的、创造性的作用。因此，他们和我在读者反应中所做的工作一样都使学术界发生了转变。对于最好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说，“人文主义者”不仅不是一个耻辱之词。而且是游戏的目的。

对于读者反应而言，它也取得了某种胜利。读者反应教学

和理论在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作文教学中颇为流行。教师们发现让学生享受和谈论他们自己对文学作品的体验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振奋人心的创举。

另一种读者反应形式是，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力图回到比文本和读者更生动、更少学究味的关系中去。有一些批评家为文学批评找到了新的形式：随笔甚或小说。这些形式允许人们表达对文本的感情，而不是挤出一篇仪式化的批评文章。

在过去十年中，我有幸跟我在佛罗里达大学文学心理学研究所的同事们——伯纳德·帕里斯、安德鲁·高登、罗斯·麦克艾尔罗伊、莫利·霍罗——一起探索这些新的可能性。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能够划清临床医生的精神分析和文人们的精神分析之间的界线。我也能够试验一种既非文学哲学家深奥的精神分析也非治疗学的精神病学范畴的精神分析的新的综合体。我认为，这种新的综合体对心智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科学综合了大脑科学家、心智语言学家、认知和感知科学家的发现。他们来自在传统上倾向于实验的学院派心理学和计算机领域。他们提出了适用于许多人（有时是所有人）的感知和认知的策略。他们描述了一种普遍化的心智。这一心智不断用一系列假设和猜测——他们把它们叫作语码和法则：有感知的、认知的、道德的或审美的语码和法则——来测试世界。这样的心智是根据这些假设的结果来感知和认识世界的。当我把我的认识反馈给世界时，世界有什么感受？

而且，大脑科学家所发现的东西恰好跟美国和英国的“婴儿观察者”的发现相吻合。他们发现，幼婴具有远比本世纪中期精神分析家所认为的简单的母婴之间的自我与客体分离远为复杂的能力。幼婴和母亲两者都经历过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

的认知和情感的反馈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复杂的成人反馈系统。

对于这些实验家来说，具有有限实证机会的精神分析似乎与他们格格不入。但是，精神分析使他们对心智的叙述更为严密。精神分析使我们能够有系统地谈应用这些法则和语码的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持有相同的假设：红灯表示停车，绿灯表示前进，但是我们都是以个人的方式——或快或慢、或呆板或灵活、或忧心忡忡或信心百倍——来运用这一假设。我们大家（我们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把红灯看作停车指示，但我们又以各自不同的方法来看待红灯。换句话说，精神分析加上认知科学给予我们一幅比心理学家给予我们的更为全面的图画。精神分析可以将产生于提供和体验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假设的不同个人的本体集中起来。这样的心智是放大的读者反应心智，因此我又回到在我孩提时代困惑我的问题——为什么查利和布鲁思觉得那个笑话好笑而我却不觉得呢？

这些日子，我发现我自己正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我将计算机革命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应用于文学研究。我在1948年第一次接触计算机。从那时起，它触及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我在信息的高速公路上潜入思想信息的巨流时，我发现我和机器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我们现在甚至无法猜测这一新技术会给我们的教学、写作和思考带来怎样巨大的变化。我想成为这些变化的一部分。

精神分析呢？我已经学够了。我认为我已不可能从精神分析那里学到我已学到的东西，尤其在当今精神分析分裂成临床研究与哲学抽象，更是如此。

当我转向这一新机器时，我记得“我所希望的，我亦害

怕，我所害怕的，我亦希望”这一格言。我觉得，在我这一新兴趣中，我在对付我以前对人类的希望和恐惧。如果我不从精神分析角度研究自己和其他人，我就无法了解我过去的主题。假如我没有经历过你将读到的故事，不了解那种希望和恐惧是我的主题的话，现在我就无法打开新的一页。

目 录

中译本序	I
弗洛伊德论莎士比亚	1
弗洛伊德和诗人的眼睛	28
人之本体	48
防御、置换与自我的代数	76
文学家的自杀：一个风格问题	97
阅读与本体：一场心理学革命	123
本体概念能为心理语言学补充什么？	132
拉康理论的弊病	186
为何这是移情，我亦未走出移情	198
弗洛伊德，物理学和文学	207
二十五年与三十天	232
文化与“我”	262
后现代精神分析	276
精神分析2000年	299
附录：著者生平与创作年表	315

弗洛伊德论莎士比亚

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十九世纪末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视为二十世纪学术生活的定义因素。看来，弗洛伊德的思想已经触及到每一个人，从躲在角落的少年犯，直到书房里的大学者。传记、历史、文学批评，还有莎士比亚研究，以上种种无一不受精神分析的影响。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这应归功于劳伦斯·奥立佛的演技）就像莎士比亚的真实身份一样，成为大众眼里莎翁形象的突出特征。但是弗洛伊德是位心理学家，而不是批评家，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如他所有的文学评论一样，只是他研究人类心智的次要方面。因此，他就莎士比亚而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都散布于许多著作之中。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明确地提出弗洛伊德关于莎士比亚究竟说过些什么，是在何处说的。本文旨在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即第一，以系统的方式阐述弗氏对莎翁的评论、涉及莎翁作品之处以及引用的莎翁诗句；第二，以脚注形式列出上述三者的参考文献。我以如下次序归纳弗洛伊德的评论：首先，他对莎士比亚的一般评论；第二，他对莎翁身份的观点；第三，他对莎翁某一特定剧本或诗歌所作的评论（以英语字母为序）。在同一大类内，内容安排以主题之普遍性为序，越具普遍意义的主题越居先。同一作品内若有